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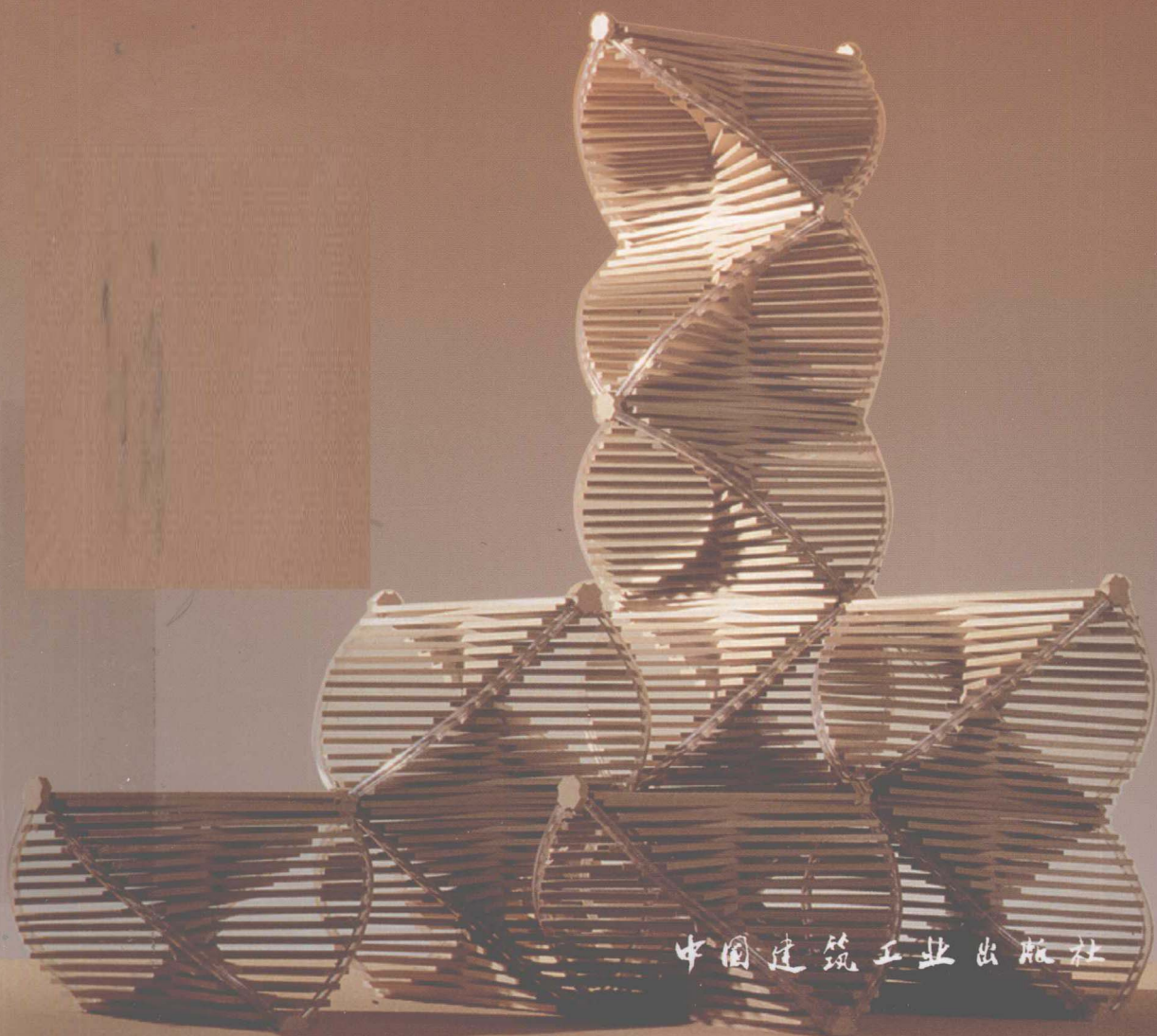
丹下健三与新陈代谢运动

——日本现代城市乌托邦

[美] 林中杰 著

韩晓晔 丁力扬 张瑾 叶文婷 译

丁力扬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丹下健三与新陈代谢运动

——日本现代城市乌托邦

[美] 林中杰 著
韩晓晔 丁力扬 张瑾 叶文婷 译
丁力扬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0-357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下健三与新陈代谢运动——日本现代城市乌托邦 /（美）林中杰著；韩晓晔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5

ISBN 978-7-112-12965-2

I. ①丹… II. ①林… ②韩… III. ①城市建筑-建筑设计-研究-日本
IV. ①TU984.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6916号

Kenzo Tange and the Metabolist Movement Urban Utopias of Modern Japan / Zhongjie Lin

Copyright © 2010 Zhongjie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英国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公司的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孙 炼

责任设计：陈 旭

责任校对：姜小莲 关 健

丹下健三与新陈代谢运动

——日本现代城市乌托邦

[美]林中杰 著

韩晓晔 丁力扬 张 瑾 叶文婷 译

丁力扬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华鲁印联（北京）科贸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7×960毫米 1/16 印张 18¼ 字数 442千字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9.00元

ISBN 978-7-112-12965-2

（2019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献给我的外祖父孔宪镛

序言

矶崎新

有这样一群关注建立未来乌托邦景象的人们，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组织相关活动，并且在具体的实践中融进自己的想法，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艺术、社会以及政治领域的活动中扮演着领袖角色，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先锋派或前卫派。有人会认识到开始于20世纪初的现代艺术运动的历史特征正与此相吻合。现代艺术和建筑学充分发展的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前卫运动如雨后春笋，往往先形成一个运动，相关的宣言式纲领随后被提出。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未来主义运动（Futurism），很快其他类似的运动接踵而至。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随着各种“主义”出现的运动还有印象派（Impressionism）和立体主义（Cubism），直至象征主义（Symbolism）。此外，自1910年左右起，各种艺术派系，例如未来主义、纯粹主义（Purism）、达达主义（Dada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以及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思想扩散和传播，继续创造这个被称为现代艺术运动的更广泛的潮流。建筑设计领域的历史与以上提到的所有艺术运动有完整的重叠。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学院化（institutionalizing）的趋势，而不是以一个个单一运动的形式出现。荷兰风格派（De Stijl）、包豪斯（Bauhaus）、俄罗斯构成主义（Russian Constructivism）等等这些思潮同时发展并最终形成一个大会式的组织，也就是后来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因此，对于20世纪的艺术和建筑运动的描述遵循了由多群体组成的单一图表体系。最后，现代艺术和建筑学的历史就是根据前卫运动的历史来阐述的。

新陈代谢派于1960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为现代建筑运动中最后一个有宣言提出的例子。我认为，广义上说，前卫运动的历史作用在1968年的全球性文化变革失败时就终结了。当然，在1968年之后，前卫和前卫主义的说法还仍然被提起，但是这一现象更像是一种隐喻修辞，失去与前卫运动相关联的历史意义。激进的运动和思想，脱离了思维意识的羁绊，仍然在继续推进。然而，前卫的先锋运动有组织地以实

现某个单一的思想来推动某一宣言的最初模式再也不存在了，先锋运动的历史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

今天，让我们再回头看下半个世纪前出现在东京的新陈代谢运动，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一运动当时所依托的两个层面的背景。一方面，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一个位于远东边缘的国家的特定文脉。关于现代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新陈代谢运动是有乌托邦诉求的现代艺术和建筑运动的最后范例。它为日本现代建筑努力与现代主义全球发展趋势进行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立足点。

1960年前后，由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普遍都到了要退休的年纪，所以新一代人的登场也成为必然。与此同时，建筑领域的状态也随着社会变革而改变。换句话说，到1968年成为明确趋势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在那时已经出现一些迹象，并开始酝酿了。但是，我相信新陈代谢运动无疑应该被定位为20世纪的最后一波现代主义建筑运动，而非后现代主义的开始。

笔者在这里希望添加一些补充说明，以解释这种最终致使这个有着技术乌托邦本质和纯粹形式主义倾向的运动出现的特殊背景，以及这一运动为何出现在日本这个位于远东边缘地区的国家，而非那些处于西方世界最中心国家的原因。日本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二战结束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被外国军事占领。现代建筑运动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最初阶段发展之后，此时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区域转化过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为1930年以来日本对现代建筑的接受过程添加上特殊条件的话，那么日本的本土化（domestication）也能够被看做一个独特的转变过程，这里我将其称为“日本化”（Japanization）。

如果我们切换到作为那个年代前卫现代建筑运动中心的1930年的苏联和德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建筑已经处于遭受政治批评的危急时刻。由于反现代主义（counter-modernism）的斯大林主义（Stalinism）和纳粹主义（Nazism）的抬头，这两个国家的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开始被遏制。恰恰是同一时期，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处于现代运动边缘的国家已经开始接受来自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这些国家已经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但是这些国家的现代主义进步运动的出现并非是一个自发性的演进过程，而是成为这些国家试图从现代主义诞生的中心移植这种运动的种子。而现代主义进步运动的倡导者们是诸如评论家、建筑师和艺术家这种可以决定这个运动的具体内容的

角色。因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等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是先移植再接受的过程，所以现代主义内部最终得到转化的方面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在这一过程中，评论家、建筑师和艺术家这些骨干力量作为推动者和权威人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有必要关注这些人1930年前后的活动，包括帮助南京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知识分子，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任设计馆馆长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和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教授岸田日出刀（Hideto Kishida）。

中国国民党政府建造了一些民族性的现代纪念建筑，例如中山陵，通过这些建筑将中国传统屋顶和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特殊的现代设计风格。此过程中，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跟随保罗·克雷（Paul Cret）学成之后回到中国的梁思成崭露头角。他的建筑活动的重要性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论述之中得到充分体现。

菲利普·约翰逊1932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现代建筑国际展览”（Moder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并同H·R·希区柯克（H. R. Hitchcock）一起出版了《国际式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一书。虽然这本书的基础是对发源于欧洲的前卫建筑运动的整体研究成果，但是菲利普·约翰逊对密斯·凡·德·罗却有着个人化的偏爱。在包豪斯晚期后人文主义思潮的指引下，密斯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现代主义建筑主流。密斯对现代主义建筑的诠释也伴随着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塑造，他融合了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产业主义（industrialism）和大都市化（metropolization）这些意识思潮。密斯的诠释也导致了“现代建筑就是‘国际式’”这个普遍的观念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国际式”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世界范围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双重统治地位传播开来。20世纪30年代对密斯的普遍承认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端。

1930年前后，丹下健三在东京大学的导师岸田日出刀作为日本建筑的领军人物，选择了勒·柯布西耶。当时，前川国男（Kunio Maekawa）和坂仓准三（Junzo Sakakura）已经在柯布西耶巴黎工作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当然还有许多日本人在包豪斯学习过，但岸田日出刀从这一代人中选择了前川国男和丹下健三，并对他们的建筑活动支持倍加。相比之下，坂仓准三是较纯粹地移植了柯布西耶的形式的人。而岸田尝试着从现代主义中的建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日式建筑，并寻找一种模式能与柯布语言（Corbusian elements）相结合。丹下健三明确对这一目标做出了

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接收与转化已经以本土化的方式开始影响日本建筑。20世纪50年代，这个争论重新浮出水面，表现为“民族元素”（national element）和“现代元素”（modern element）之间的对抗和整合。

20世纪30年代，这些处于现代主义建筑辐射边缘的国家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多种多样的现代主义建筑流派，但同时也努力和各自的民族特点保持一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隔，这个过程以本土化的形式进行，现代主义在每个单独国家都得以独立发展。20世纪50年代，这些国家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已经逐渐成熟了。由于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美国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它也随之开始试图把功能主义的国际主义风格传播到世界各地。直到越南战争爆发，这一全球化的趋势才开始有所动摇。

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联合苏维埃俄国的力量开始着手建设全新国家，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的艺术方法的影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用于反对早期俄国前卫艺术的旧形式主义。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开始努力去除斯大林主义的神话色彩。然而，在建筑领域，苏联并没有超越简单的产业主义和功能主义；而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也深深影响了新中国同时代的建筑风格的形成。当时的中国官方邀请了许多自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师（socialist realist architects）和艺术家来主导建筑领域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以某些政治原因拒绝了梁思成基于现代主义的立场，以及他以提升和保护中国传统建筑为目的的方法性的改良尝试。当时的中国，把接受并推行一种折中风格（参见北京大都市规划和国庆十大建筑项目）当做一项政治任务，试图创建了一种有着19世纪传统形式风格的本土化表达方式。这一时期的建设把建筑本土化引入了一个僵化的死胡同，最终导致后来对“本土方法”的重新评价。中国的现代建筑直至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前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20世纪50年代，日本进入一个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衍生出了被称为55年体制（1955 System）的稳定的国家福利政策。¹它是在日本农业解放改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财团（zaibatsu）的解体之后，伴随着朝鲜战争在邻国爆发并支撑了日本经济保持繁荣状态的时候出现

1 55年体制指的是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一般认为该体制结束于1993年。55年体制一词最早见于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于1964年发表的论文“1955年的政治体制”。（《思想》1964年4月号）——译者注

的。尽管政治体系经历了更替，而社会结构也在重组之中，但日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依旧沿着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与传统和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主线继续发展。丹下健三从1930年起一直处于这场论战的核心位置，并继续形成他自30年代开始塑造的一个独立模式。这个模式采用简单的辩证命题，即绳文式（Jomoneseque）=平民主义（populist）=民族性（ethnic），与之相对立的是弥生式（Yayoi esque）=精英主义（elitist）=国际化（international）。丹下健三和对西方先锋派深有研究的冈本太郎（Taro Okamoto）都倡导这种在两个极端共存的张力之中产生的辩证关系。事实上，丹下健三是最早提出两方面共存理论的，他在他的广岛和平纪念馆（1955）和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1964）的设计中对这些特征都有所诠释，能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这两个建筑都是国家级项目。换句话说，尽管“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在二战结束之后已经被淡化，而且国力下降，但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强势依然存在。这种建筑文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延续到1970年的大阪博览会。

总之，到了1930年前后，在欧洲前卫建筑思潮的指引下，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根据各自的民族条件对现代主义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这一接受和消化的过程大约持续了20年多年的时间，即所谓的现代主义的本土化的过程。中国的梁思成、美国的菲利普·约翰逊（他在美国以评论人和建筑师双重身份发挥作用）和日本的丹下健三作为同一代人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的工作体现了现代主义最后的形式转变。在他们之后，尽管有许多建筑师仍自认为是现代主义者，但是整个现代主义建筑的面貌在很多方面开始逐渐偏离简单的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线形演化过程。从1968年的文化变革开始，建筑先锋派作为文化运动终于摆脱了长时间的挫折。人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和平相处到对抗对立的关系的转化现象。在日本，直到1970年前后，这两方面才有之间合并的迹象，但是在那之后，资本主义有取代民族主义的趋势。相对而言，民族性的国家形象渐处下风。19世纪的国家的形象由它的首都的建筑来表达。到了20世纪，大都市自身成为主角，对都市现象的关注也逐渐超过对单个建筑的关注。简言之，“城市”成为最能体现20世纪人类社会形象的主要方面。从现代主义伊始，人们就预见到了这种状态的必然性。然而，这些问题已经完全超出了国家范畴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也成为20世纪中期社会问题的综合体现。新陈代谢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丹下健三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城市”和“建筑”的讨论范围。那时，他在东京大学建筑工程系下属的二战后组建的城市规划方向担任助理教授。然而他讲授和研究的内容并不是通过立法和城市规划来控制城市的必要技术或手段，而是有关城市形态的历史发展内容，也被称为城市主义或城市设计（Urbanism/Urban Design）。丹下健三研究了由柯布西耶所领导的关注城市主题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运动。这种研究不同于那些官僚政府采取的以现实为依据建立法律条文而后加以实行的具体的城市规划方法，而是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角度出发，目的在于推动社会变革的有乌托邦倾向的尝试。广义上说，现代主义就是一次乌托邦运动。从二战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圈纪念馆设计（1942）开始在丹下健三事业的整个发展期中，“城市”一直是他探讨的主题。而这一概念在广岛和平纪念中心项目（1949~1955）中得以实现。这个设计在1952年以城市核心为主题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会议中得到称赞。作为广岛原子弹爆炸废墟复兴的纪念地，它在最纯粹的层面上提供了一个代表现代主义乌托邦城市规划的具体形态。

如上所述，相对于19世纪各国首都以建筑为优先，20世纪大都市就更多地关注城市本身这一主题。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重建计划预示着城市主题的兴起：保守的修复性的规划成为主流，正如整个欧洲的大多数重建规划除了极个别例子如1955年的“柏林重建设计竞赛”，这个竞赛表明城市不可能简单地被复制。例如，华沙和法兰克福的市中心重建计划简单地成为复原工作。即使是在大部分的木质建筑被完全烧毁的日本，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演。在废墟上重建一个城市的方法依然是当时被普遍认同并形成惯例的最流行的城市规划方法，因此，那些基于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现代主义原则的乌托邦规划建议就没有任何插手重建工作的余地。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只有一些城市，如昌迪加尔和巴西利亚，留下了乌托邦规划的印记。此外，当现代主义的实现方法内部存在的矛盾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时，那些规划项目也就跟着沦为失败的案例了。

20世纪5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持续增长期，并且在保守党为了稳定社会福利体系而颁布1955年体制之后，人口开始向大城市集中。换句话说，东京这类城市必定要经历城市形态的变革，大都市消除了它原先的边界（例如城墙）并向周边区域（主要是耕地）延伸。随着旧有市郊被全部都市化，东京已经没有再继续扩张的余地了。随着城市生长，市区内的土地所有权被瓜分，过度拥挤的状况就凸显出来。此时，将城市区域延伸到东京湾的规划也应运而生。这样的概念最初是一些财政部

门和负责城市政策的官员提出的。丹下健三对此持谨慎态度，他借着被邀请到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访问讲学的机会，对波士顿港的海洋城市规划做了研究，就此开始了他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丹下健三在1960年东京世界设计大会（Tokyo World Design Conference）上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模型——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新陈代谢派将宣言印制为小册子并分发出去——然后他着手开始了1960年东京规划（Plan for Tokyo 1960）的工作。这个项目一直持续了整个1960年，并且由丹下于翌年新年之际在日本NHK的特别节目中正式提出了这个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是通过电视媒体初次公开亮相的。

这个乌托邦项目确实是从一个子虚乌有的土地上开始的。如果我们假设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地方，那么1960年的东京规划就的确是一个乌托邦规划。

（日译英：Ken Tadashi Oshima）

目录

序言	矶崎新	v
导言	城市演进	1
第一章	新陈代谢1960	18
第二章	新陈代谢主义的乌托邦	73
第三章	东京湾神话	143
第四章	结构与象征	183
第五章	世博1970	212
后记	追溯逝去的未来	247
	参考书目	266
	图片版权	279
	致谢	281
	译后记	284

导言

城市演进

“一张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因为它忽略了长久以来人文精神所登陆的那个国度。”

——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下的人类灵魂》（1891）

前瞻性的城市规划往往以诠释特定社会理想的乌托邦形式出现。这种现象在处于政治、经济和美学重大转变中的社会中更加明显，比如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即将进入20世纪时的整个欧洲大陆。这些国家在这些特定时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乌托邦主义的最佳范例。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日本社会也逐渐显现出成为孕育乌托邦式城市设计构想的另一块富饶土地的迹象。日本的现代城市乌托邦构想与诞生于1960年被称为“新陈代谢主义”的前卫运动密切相关。1960年，一群年轻的建筑设计师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设计大会上出版了他们的宣言——《新陈代谢1960：新都市主义的提案》（*Metabolism: the Proposals for New Urbanism*）。⁽¹⁾宣言呼吁彻底改造现代城市，新陈代谢派认为只有这样的改造才能带来新的城市秩序，而这一秩序对一个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至关重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新陈代谢派不断发展和丰富了自己的城市设计概念，他们的规划往往设想海洋和天空作为未来人类的栖息地，他们展望城市将以特定的方式生长和变迁，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和演变。这种未来主义的语境和技术的乐观态度出现得正是时候，60年代不仅仅被称为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新纪元，同时也见证了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奇迹”的历史时期。新陈代谢派的乌托邦尝试引入新的城市规划理论，作为对日本在这段时期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转型的反应。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规划的目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彻底解决国家的政治转型和文化振兴的矛盾。

新陈代谢主义城市乌托邦的思想根源是一种特殊的理念，称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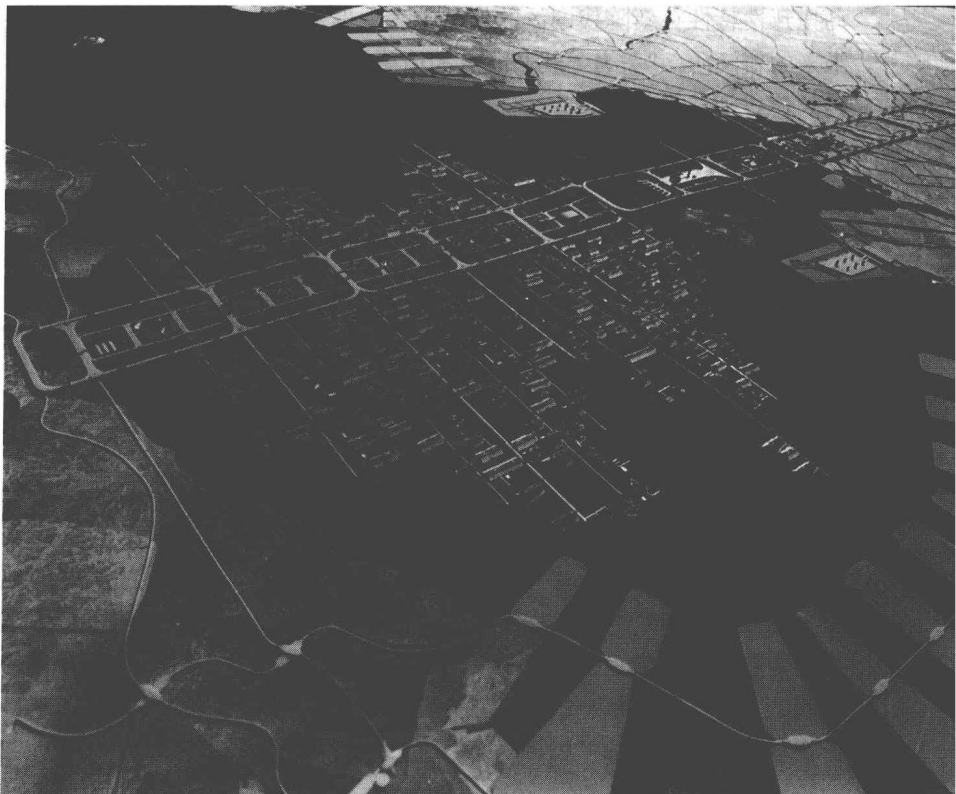
市演进”。这种理念与现代主义城市设计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设计概念如人工地形、城市建构、海洋文明和代谢周期等，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新陈代谢主义社会变革的理想。面对当时城市迅猛扩张和变化的不可预测，新陈代谢派的设计不着眼于城市最终的具体形态，而是强调设定城市演变的模式，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从始至终地遵循这种特定模式。”⁽²⁾他们视城市为一个由各种具有不同生长周期的代谢元素所组成的有机体：有些是长久性的，另一些元素的存在则极为短暂。为了适应城市的发展与再生，新陈代谢派者们以预制组件为基础发展可转换的先进技术，并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更换陈旧的建筑元素。这种发展和再生的概念被推进到整个城市的尺度，最终推翻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它对设计上几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秩序（order）/混沌（chaos）、持久（permanence）/短暂（transience）、集合（collective）/个性（individual），还有规划（planning）/自发（spontaneity）。

本书集中阐述了新陈代谢派建筑师前瞻性的城市设计概念，深入研究了他们针对日本战后社会提出的设计主张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意涵。通过追踪新陈代谢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即从1960年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设计大会的发端到规模宏大的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上的绝唱，本书切入了日本战后建筑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新陈代谢派建筑师这一群体不仅包括其中最早的一批成员，如菊竹清训（Kiyonori Kikutake）、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槇文彦（Fumihiko Maki）、大高正人¹、川添登（Noboru Kawazoe），而且也包含了一些与他们志同道合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如声名显赫的丹下健三（Kenzo Tange）和矶崎新（Arata Isozaki）。虽然丹下健三并没有成为新陈代谢运动的正式成员，但是他在新陈代谢派运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是这些年轻建筑师的导师，并且通过任职1960年世界设计大会筹备执行委员会主席，创建了一个筹备小组，这个小组就演变成后来的新陈代谢派。丹下健三的理性主义观念和对建筑和城市的纪念性的探索影响了这些新陈代谢主义者，反过来，和新陈代谢派的合作（和偶尔的竞争）也使丹下健三自己的设计理念得到了深入发展。比如说，丹下的1960年东京规划（也称为东京湾规划）代表了一种对新陈代谢城市设计概念的更深入的综合性思考，同时把乌托邦城市主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尺度和规模。

1 大高正人（Masato Otaka, 1923~），日本建筑师。毕业于东京大学，在1949~1961年间在前川国男（Kunio Maekawa）的事务所工作。他和槇文彦一起发表了有关于“集合”（group）和“群造型”（collective form）的文章。——译者注

图0.1
丹下健三，1960
年东京规划模型

©川澄明男



作为和官方的东京规划针锋相对的方案，丹下的规划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后工业时代为目的，提出对这座巨型城市的整体结构作出根本性的转变。它因此阐明了乌托邦主义和城市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正是这本书所探索的主题。

乌托邦主义与城市主义

丹下健三和新陈代谢派并非职业城市规划家，他们也没有能够实施他们的规划理念的行政权力。根据罗伯特·菲什曼¹的观点，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家与职业规划师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们对社会变革所持的不同态度，前者往往更趋向于对现状提出激烈的应对方式，而后者往往把城市规划看做“技术层面的问题”，反对把它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³⁾ 这种

¹ 罗伯特·菲什曼 (Robert Fishman)，美国著名城市历史与规划学家，密歇根大学教授，著有《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benezer Howard, Frank Lloyd Wright, Le Corbusier》，《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译者注

乌托邦性特性在新陈代谢派的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他们探索能够引导未来的新倾向，“努力寻找与既有的精英相对立的表达方式。”⁽⁴⁾ 这些年轻的建筑师认为，比起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变革将会更直接地为现代社会建立一种全新秩序。然而令他们倍感失望的是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和经济重建过程中日本大城市所产生的混乱状态，以及当权者在处理这些挑战时的萎靡无能。因此，他们用激进的提案对抗主流的城市规划，同时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愿景。

新陈代谢派的城市梦想实际上追随着一种源远流长的乌托邦城市规划的传统，在这种乌托邦模式中未来城市环境是与社会变革的理想相结合的。自古以来，无论是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是对完美社会的定义都与城市的具体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正契合了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第一个乌托邦是城市本身”。⁽⁵⁾ 然而，有意识地创造乌托邦式还是近代社会的事，它让这个词得到新的内涵。当托马斯·摩尔¹于1516年创造了“乌托邦”(utopia)一词时，这个词混合了“eu-topia”(美好的地方)和“ou-topia”(不存在的地方)的双重含义，这种模棱两可被用来描述对理想状态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批判的双重目的。⁽⁶⁾ 这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一如卡尔·曼海姆²所阐述的定义，乌托邦是一种试图超越自身在现实中的起源的“精神状态”，他在1960年写道：

所谓乌托邦是指某种与它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协调的思想状态。这种存在于经验、思想和实践中的不协调的状态旨在追求现实中不存在的目标。然而，我们应该同时意识到并不是任何与其所处现实条件对立或者超越现实基础的思想状态都是乌托邦。只有那些超越现实并且在由思想转化为物质现实的过程中会击碎现有秩序的倾向才能算得上是我们所提到的乌托邦思想。……当我们把“乌托邦”一词的范畴限定在有超越现实同时打破与现存秩序的纽带时，乌托邦和通常意义的意识形态就区分开了。⁽⁷⁾

虽然曼海姆强调乌托邦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但他也承认乌托邦和产生它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⁸⁾ 显然，乌托邦的产生总会与

1 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 1478~1535)，英国政治家、作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乌托邦》一书，此书对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2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社会学家，影响了20世纪前半叶，是古典社会学之父。——译者注

现实有或多或少的瓜葛。因此，乌托邦式的城市项目往往出现在新的社会秩序挑战旧的社会秩序的转型时期就毫不奇怪了，比如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工业革命时期。早期文艺复兴时期见证了阿尔伯蒂¹和菲拉雷特²在各自的著作中所阐述的人文主义理想城市的观念，以及很多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乌托邦社会的描绘。⁽⁹⁾工业革命期间日益恶化的城市状况和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伴随着急剧增长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构成了包括罗伯特·欧文³、查尔斯·傅立叶⁴和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⁵的一系列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式假想的社会背景。⁽¹⁰⁾同样，新陈代谢派沉迷于技术的乌托邦倾向的出现也非偶然，事实上，二战后日本混乱然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动荡也成为滋生建筑师们激进的城市重构思想的土壤。

在很大程度上，乌托邦涉及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难题，涉及对不同的社会观念之间的激辩。从现代性的根源出现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别影响了一系列乌托邦思想的形成。理性主义乌托邦往往倾向于催生一种高度集中化和规范化（甚至有时是军事化）的社会制度。而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则反对这种理性主义乌托邦，他们更强调分权和地方团结。这两大类乌托邦思想反映了社会存在的对秩序的呼吁和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矛盾，以及集中性的大型组织的依赖和要求地方自主权和个人的创造力之间的对立。这种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不仅从根源上主导了现代乌托邦思想的发展，而且为新陈代谢运动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理性主义空想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是一个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和理性的方式建构的对象。芒福德已经十分恰当地给这种理性主义的理念赋予了名称：机器。他指出：

正是在城市文明的开端不但是乌托邦城市的原型的形成

-
- 1 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著有《论建筑》，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建筑理论著作。——译者注
 - 2 菲拉雷特（Filarete），原名 Antonio di Pietro Averlino（1400~146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活跃于佛罗伦萨的建筑师、雕塑家和建筑理论家。他最著名的经典设计是斯福津达（Sforzinda）的理想城市设计。——译者注
 - 3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 4 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 5 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Claude Nicolas Ledoux）最早期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之一。他应用他的建筑信仰设计了很多法国建筑和绍村（Chaux）的理想城市计划，之后被广泛认为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译者注